



ZAI ZHE XIWANG DE TIANYE SHANG
NONGCUN XIN JINGJI ZUZHI FAZHAN ZHONG
DANG DE JIANSHE TONGBU GENJIN YANJIU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
党的建设同步跟进研究

任学辉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D267-2
7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
建设同步跟进研究

任学辉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跟进研究 / 任学辉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643-1463-7

I. ①在… II. ①任… III. 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9110 号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跟进研究

任学辉 著

责任编辑	邹蕊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10 mm×285 mm
印 张	21.375
字 数	64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463-7
定 价	6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序

本书是作者于 2007 年申报的四川省党校系统重大研究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该课题研究的是农村新经济组织及农村基层党的建设问题。在这类研究中,目前对农村合作组织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颇多,对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的研究也很多,但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却不多。而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比较透彻地研究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则很少。本书是这类研究的力作。

本书围绕“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跟进”这一主题,设计了“农村新经济组织”“党的建设”“同步跟进”“发展”四篇。每篇由四个子课题构成,共 16 个子课题。全书层次清晰,结构严谨,具有内在逻辑性。在对每个子课题进行研究时,紧扣主题,论述深入,中心突出。在内容上,本书对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对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及党建模式进行了归纳、梳理和理论上的剖析。全书有很多图表说明,可以看出,作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了很大工夫,钻研深入,治学严谨。

近年来,各地农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我国山东、浙江、江西、四川等省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这些具有不同程度“合作性”的新经济组织,在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在对农村经济社会产生基础性、前提性和本质性的影响,并具有更广泛的全局性意义;而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进入其中,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民得实惠”的目标,而且可以更好地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领导,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取得农村党的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的效果。本书的书名是歌名加“这”字,力图体现这种现实,以期引起社会对这一现实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说:“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论述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大体上仍然是适用的。甚至说,正因为有了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才使得我们今天对列宁《论合作社》的理解能够真正到位。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体观点,可能因时代的推移而过时,但其基本原理却具有通古今之变、放四海皆准的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就是这样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现已成为中学生的常识,其重要性其实并不在于掌握,而在于运用。怎样对因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农村新经济组织这样新的生产关系进行观察,怎样对由此而引起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进行思考,以及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或者说应该产生怎样的反作用,本书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探索。

本书的创新之处很多。比如,对合作行为产生的内在机理的研究,颇有深度,加强了本课题的理

论基础；认为“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判断是准确的、符合实际的；提出“农村新经济组织是中国‘社会’崛起的生长点”，观点新颖、突出，论证可靠。再比如，通过历史地、现实地、逻辑地证明，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进是一个积极的、渐进的过程，进而揭示出党的组织演进规律和活动规律，颇有新意；而且，课题最后从更广泛的视角提出，“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跟进，开启了中国社会各子系统形成分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达到了一个理论高度。这样的创新之处还有很多，可以说遍布于课题的每一个小标题上，需要读者细细体会。

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跟进研究，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本书的出版，相信对于我们理解农村新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革命性意义，对于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更好地把握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组织的职能作用，更好地推进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创新，能够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给予积极的实践指导！在此，也祝愿作者在科研工作上取得更大成果，为新时期基层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硕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2011年9月

目 录

总 论	1
第一篇 农村新经济组织	9
子课题一 农村新经济组织概念剖析	11
子课题二 农村新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分析	30
子课题三 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	48
子课题四 农村新经济组织是中国“社会”崛起的生长点	72
第二篇 党的建设	89
子课题五 农村新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文化背景的支撑	91
子课题六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促进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112
子课题七 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大力支持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	131
子课题八 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要走民办公助党领导之路	148
第三篇 同步跟进	167
子课题九 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要求转变党组织的领导方式	169
子课题十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进是一个积极的渐进过程	185
子课题十一 农村新经济组织中党的组织建设演进规律研究	201
子课题十二 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组织活动演进规律研究	217
第四篇 发 展	235
子课题十三 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与党的建设地区差异状况考察	237
子课题十四 问题及分析	259
子课题十五 对策与建议	281
子课题十六 开启中国社会执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形成分工合作 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	297
参考文献	321
调查概况	322
子课题索引	325
后 记	334

总 论

农村新经济组织是我国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生事物，正在对农村经济社会产生基础性、前提性和本质性的影响。农村新经济组织往往是党的建设的空白领域，党的建设需要进入其中，“占领阵地”，推动其发展。但是，农村新经济组织往往具有市场主体属性，或者说正在向市场主体的地位发展，党的建设的跟进不能不顾实际，华而不实，越俎代庖。怎样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怎样准确定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作用，以促进农村新经济组织又好又快的发展，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新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

农村新经济组织是一大类具有不同程度“合作性”的农村经济组织，其产生和发展对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讲：“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合作社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把租让（顺便说一句，租让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么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①“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②这些论述对于今天中国农村新经济组织而言，大体上也仍然是适用的。因此，应当加强对它的研究。

（一）对“农村新经济组织”概念的界定

对“农村新经济组织”这一概念的界定，理论界并不统一，但其核心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主要是指当前农村中正在成长起来的、显著区别于传统组织的、为农村社会提供政府和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益性服务的各类农村组织。它首先是一种“经济组织”，对于满足“农民组织化”需要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它是一种“农村组织”，而不是“农民组织”“农业组织”，外延更大。它自然属于新经济组织的范畴，但同时它又具有很多新社会组织的属性，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大类具有不同程度“合作性”的农村经济组织。农村新经济组织是客户、惠顾者、所有者、控制者四者统一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新”在与我国近代历史上各类合作组织均有所不同。其“合作性”的本质属性体现在，农村新经济组织是联合经营和家庭经营相统一、劳动地位和资本地位相统一、权利实现和义务体现相统一、公益目标和盈利目标相统一。它的主要类型包括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和新型农村企业三大类，其中主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协会、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龙头企业改进型五种形式。使用“农村新经济组织”这一概念比使用合作组织范畴更具有概括性，比引用西方术语更具有适用性，比采用农民组织概念更具有探索性，确立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

（二）农村新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动因

纵观世界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合作运动的发展高潮往往出现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其发展大致经历了 20 世纪

^①、^② 列宁：《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0、767 页。

80年代中期以前的萌芽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兴起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末期的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加速阶段这四个阶段。其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动因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内在矛盾激发了农户对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强烈需求,而政府结构的内在缺陷难以产生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农村新兴的致富能人则以自身的社会资本发挥重要的替代功能,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农村新经济组织的产生起了催化作用。合作是一种复杂现象,还需要运用博弈论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促成合作产生的博弈是一种“回报策略”,这种博弈具有四大基本特性或者说基本要素,即“无限的重复性”“利他的善良性”“清晰的报复性”“有限的宽容性”,由此孕育了合作的内在机理。现实中的博弈要导致合作,尚需要合适的行为空间、共同的需求目标、足够的外部压力、先驱的率先垂范等一系列基本的外部条件。内外因共同作用,决定了农村新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

(三) 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

农村新经济组织实质上是提供农村经济类准公共物品的社会主体。农村准公共物品在空间上具有相对性,从而在受益上具有局部性;在时间上具有动态性,从而在性质上具有转换性;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从而在差异上具有细微性。它是一个连续的谱系,我们可以根据消费的竞争性和技术的排他性,把它分为社区类、营销类、技术类、生产类、金融类、资源类、农机类七类。农村新经济组织的本质功能在于提供农村经济类准公共物品,它具有外部正效应,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它显然具有微观功能,能降低交易成本、加快技术转移、提升产业水平、增强凝聚力量;它具有明显的宏观效应,能破解土地难题、提高投入效率、承接公共职能、拓展国际市场。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正在对农村经济社会产生基础性、前提性和本质性的影响,它将剥离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倒逼乡镇政府机构的职能改革,抗衡农村外部市场的强力冲击,驱动传统合作组织的结构演变,对中国农村社会关系进行全面再造。农村新经济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

(四) 农村新经济组织是中国“社会”崛起的生长点

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崛起的生长点,具有全局性意义。“社会”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它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建立在个体独立基础之上,与国家相分离,其功能在于进行第三次分配。中国现有“社会”主体均存在着诸多不足,社团组织具有较强的“官民二重性”、经济类中介组织逐利性太强、事业单位改革真正到位尚有时日、非正式组织不同程度地存有不稳定因素。因此,中国“社会”崛起重点要看农村,农村“社会”建设更具基础性;农村由“弱社会”变“强社会”具有艰难性,更需关注;村民自治组织是一类重要的“社会”主体,但出现了明显的官方性;而一些学者主张成立的农民维权的政治性组织——农会,在当前农村并不具有操作性。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建设具有标本性意义,其自主性多于依赖性、经济性多于政治性、广泛性多于局域性、成长性多于权宜性。其发展也许不是中国“社会”崛起的唯一生长点,但一定是真正的生长点。

由上可见,农村新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合作经济应当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此作出评述:“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这不就是‘可能的’共产主义吗?”^①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当前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以此促进我国农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提出,要大力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特别是为农村新经济组织定位和护航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农村新经济组织进入依法发展的新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我国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组织确定了发展方向。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进具有必然性

农村新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来自于人们文化的觉醒和共识,它的困境也主要来自于人们文化的缺陷和偏失。没有文化背景的支撑,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难以持续和稳定。文化问题是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最主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启蒙非常重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是社会关系的总调节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促进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最重要的扶持力量,应大力支持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社会”、企业等也是支持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加强对这些社会主体的协调、引导、指导,延伸其组织功能,走民办公助党领导之路。

(一) 农村新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文化背景的支撑

农村新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难以独行其善,它极大地依赖于深厚的文化背景。博弈论对合作的描述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存在着较大距离,因为行为人的偏好是不单纯的、理性是不完全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博弈是不充分的,这些“局限性”的背后就是文化。经济行为与文化背景不可分割,现代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使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合作组织离不开合作文化的支撑,合作文化是合作组织的灵魂,是推动合作组织发展的不竭动力。社会学家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力图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由远及近表现为四个层次的概念或范畴:存在常态——习俗及道德,重要范畴——场域及惯习,集中展现——非正式制度及组织文化,宏观表述——文化力及文化嵌入。在我国漫长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形成了一种以农耕为基础的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主要表现为非主体意识、非开放意识、非集团意识、非公正意识。“中国村落的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因此,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需要文化的输入,文化输入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培植信任。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建立政策激励,形成共同预期;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变农民认知;需要培植中坚人物,强化凝聚能力;需要构建参与网络,积累社会资本。

(二)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促进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促进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最重要的力量。首先,在地位上,中国共产党有资格和义务成为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最重要扶持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具有广泛的组织基础;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具有坚定的价值取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其次,在特征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从内容性质上看,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群众性;从理论形式上看,具有完备的系统性和权威性;从历史过程上看,具有相对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从目标指向上看,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能动性。再次,在功能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的总调节器。从外部环境看,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导向功能;从初始条件看,具有凝聚功能;从运行过程看,具有激励功能;从保障作用看,具有约束功能。最后,在途径上,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化依赖于新型政治精英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精英政治的客观存在源自于深层的文化土壤,社会文化的流变集中体现为政治精英的变迁,精英治理在民主政治中具有不可避免性,越到农村基层越呈现出精英政治的形态。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大力支持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

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已很久远，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有史以来存在着四种关系模型：虚置型——传统乡村社会呼唤政党下乡、依存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开始乡村社会再造、同构型——全能主义政党的超度扩张、游离型——市场冲击下农村社会的艰难转型，由此呈现为一个产生、形成、强化、疏离到合作的发展过程。当前以农村新经济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的崛起，可能对党的执政基础形成冲击，如可能挤占党的社会空间，可能离散党的政治权威，可能解构党的意识形态，可能侵蚀党的基层政权。但我们看到，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村新经济组织是天生的合作伙伴，两者追求目标互合、行为缺陷互补、人才供给互通、外部效应互利。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理应大力支持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增强开放思维、服务思维、包容思维和合作思维，促进以农村新经济组织为代表的农村“社会”的成长。随着以农村新经济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的发展，党与“社会”的关系将形成在党领导下的合作型关系。

（四）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要走民办公助党领导之路

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实际上面临着以文化为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村庄结构日渐破碎，小农经济极度分散，经济理性无限膨胀，集体经济十分脆弱。因此，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司法等各个社会主体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些社会主体均难以独立成为“第一推动力”。政府组织是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但已基本退出乡村社会；资本具有巨大的组织力，但对资本下乡要慎重；非政府组织是促进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的积极力量，但难以带来持续稳定的效益；国家法律力图嵌入乡村社会，但与传统的生活逻辑并不完全契合。农村各个社会主体发挥作用，均需要党组织的综合协调。在政党政治主导政治生活的大背景下，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不能脱离执政党独自行其道，而是对党组织的依赖具有必然性。“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①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既非完全自下而上的，也非完全以国家力量推动为主的，而是在尊重农民自主性的前提下，以政党推动为主，其他力量密切配合，走民办公助党领导之路。

可见，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外部力量特别是文化力量的依赖具有天然性。注重思想的启蒙、文化的先导，这是合作组织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中，党组织是把握方向的“掌舵者”，是协调各方的“协调者”，是各方协商合作的“促进者”。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确立在公共舞台上的“主心骨”地位，增强整合思维，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

三、“同步跟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跟进方式的最佳定位

面对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党组织的随之跟进是必要的，但党组织的跟进对于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还要取决于党组织的跟进方式。两者之间的关系定位应是“同步跟进”，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进是一个积极的渐进过程，其根本原则就是要张扬农民的权利本位。“建党”与“党建”是党的建设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党的建设的“同步跟进”要体现在“建党”和“党建”两个方面。改革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对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能做出科学定位，对于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3页。

（一）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要求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

从职能上看，农村基层党组织近乎于一个全能型组织。它要履行政治领导、政务推行功能、经济发展功能、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一核三类”的“四合体”。这种全能型的制度安排，在农村有着积极作用，但也使得从上到下党组织的权力可以一以贯通，方便了县、乡、村各级党组织的权力扩张，给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良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搞“拉郎配”，强制推行土地流转，违背农民意志和利益；搞“一窝蜂”，伪合作组织泛滥，套取国家补贴；搞“瞎指挥”，以权力干预农民经营自主权，伤害农民积极性；搞“放敞马”，放任自流，指导不力。随着农村新经济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的崛起，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对党的政治灌输方式、对党的公共决策方式、对党的社会动员方式、对党的监督管理方式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党必须切实转变领导方式，实行宏观式领导、间接式领导、协商式领导、程序式领导。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提高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真正达到党在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进是一个积极的渐进过程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的“跟进”主体，其角色及作用定位非常关键。只有定位准确，才能关系顺当、工作顺利、相互推动。历史不可不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警示我们不可“急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警示我们不可“叠进”，“社会崇拜”的历史警示我们不可“缓进”，“两社”改革的历史警示我们不可“盲进”。在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进是一个积极的渐进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定位只能是“同步跟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准确把握两者之间恰当的位置关系，在思想上要亲近，不可缺位；在角色上要分清，不可越位；在反应上要适时，不可错位；在运作上要规范，不可失位，要反对非此即彼的、机械的思维方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进是一个积极的渐进过程，这是因为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约束。“制度兼容”决定了正式制度的推行是一个渐进过程，“路径依赖”决定了乡村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时间维度”决定了信任的建立是一个渐进过程，“市场背景”决定了合作经济的成长是一个渐进过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同步跟进”，其根本原则就是要张扬农民的权利本位。必须坚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不搞强迫命令；必须坚持自我管理的原则，不搞包办代替；必须坚持按照合作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不搞行政干预；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不搞一刀切。

（三）农村新经济组织中党的组织建设演进规律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跟进”首要的、基本的着力点。创新党组织设置形式的基本原则是，以产业为引导，突破地域局限；以发展为主线，探索多种形式；以党章为依据，确立组织层级；以实效为根本，把握设置时机。绵阳市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同步跟进”的基本模式有安县柏杨村的支书创办型模式、江油白玉村的以强带弱型模式、三台芦溪镇的产业基地型模式、涪城龙门镇的专业分工型模式，这四种模式的组织化程度随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而逐步提高。在加强农村新经济组织中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要加强与党组织设置相关的配套建设。应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配强领导班子，通过“双层登记、动静结合”理顺党员队伍，通过“双轨并行、制度衔接”规范组织职能，通过“双重管理、条块互动”明确隶属关系。在此基础上，要构建农村党建的多层推进战略。应以村社集体经济合作社为直接依托激活农村社区党建，强化核心层；应以农业协会为重要示范改进农村社团党建，完善外围层；应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流形式提升农村产业党建，培植新生层；应以龙头企业改进型组织为可靠纽带带动农村企业党建，拓展联系层。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从实际出发，建立和拓展党的组织，努力提高党组织的覆盖率。

（四）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组织活动演进规律探析

“建党”是推进农村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性环节，而“党建”即农村新经济组织中党组织能否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同时还要看其具体的活动开展得如何。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组织活动规律的研究。党组织活动的“跟进”，应是多样性、综合性的，应在组织、制度、价值、能力各个领域全方位展开。重心下移、服务下沉，充分发挥各自的服务功能，这是前提；着力于建立普遍性的制度激励，打造和优化宽松的制度环境，这是重点；既重视正式制度的供给，更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供给，加强文化输入，这是根本；努力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科学制定政策的能力、协调各种利益格局的能力，这是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发挥有区别的功能，在组建期要发挥牵头作用，在发育期要发挥扶持作用，在扩张期要发挥联络作用，在成熟期要发挥保障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实施必要的监管职能，主要是引领政治方向、规范利益追求、构建精神文明、维护正当权益。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应随之实行真正转变，在服务方式上要采取亲近性姿态，在管理方式上要尊重主体性地位，在领导方式上要注重人格性因素，在教育方式上要做出灵活性安排，从而真正发挥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个代表”的作用。

可见，面对以农村新经济组织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崛起，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切实转变领导方式，把全面干预农村社会事务的领导方式转变为以农村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而党的建设“同步跟进”体现了这种转变，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村新经济组织两者之间关系的准确定位，能够实现两类组织的对接共振，是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展现。各级农村基层党组织既要在“建党”上“同步跟进”，也要在“党建”上“同步跟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改进党的建设的思路和方法，真正发挥党组织的职能和作用。

四、进一步推进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目前，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已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最重要主体，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党的建设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性，就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其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循序渐进地、实事求是地引导其健康发展，使之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新引擎”。而且要看到，以农村新经济组织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崛起，必将引起也必然需要我国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变革。

（一）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及党的建设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性

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已有了很大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最重要载体。但由于农民行动逻辑与其所处文化区域相关，而文化区域又往往与生态区域有关，因而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党的建设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从世界范围观察，欧洲合作经济传统色彩较浓，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美国合作经济更多地渗透了实用主义，商业化倾向强；日本合作经济是政府推进型；以色列合作经济则独树一帜。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大致呈东、中、西梯次推进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势头迅猛，中部地区虽有一定差距，但总体发展良好，第二级阶梯不少农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在积极进行探索，而第一级阶梯几个民族省份发展则较为迟缓。四川省因地域条件不同，大致呈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发展态势。成都平原推行“三个集中”，开辟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盆中丘陵地区接受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是发展的核心区域；盆周山地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总体上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川西高山高原地区自然条件脆弱，传统畜牧业仍处于靠天吃饭状态。绵阳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在城郊以市场推动为主，在丘陵

以联办为主，在山区则主要发展集体性的合作经济。这三种发展模式，在全川具有一定代表性。考察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与党的建设的地区差异状况，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些规律性认识。

（二）问题及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与国外合作组织的发展水平相比，与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与改革开放中社会巨大变迁所带来的需求相比，还显得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劣势。主要问题有：一是认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主要表现在理论准备不足，概念上模糊不清；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思想上有顾虑；宣传引导不力，农民的合作意识不强；对党建工作的地位认识不明，思想上存在着困惑。二是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外部制度环境还不太理想，主要表现在法律地位还需进一步明确，土地流转上存在一些问题，资金支持不足，政府的公共服务跟不上。三是农村精英人才缺失，主要表现在数量明显不足，素质总体不高，作用发挥不佳，队伍稳定不够。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定位还不准，主要表现在行政色彩过重，存在着侵害农民利益的倾向，缺乏有效的介入手段，基层党组织的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并不完全是由农村新经济组织自身原因造成的，究其原因，在诸外部因素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角色不到位，是一个带有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是制约我国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的首要外部因素。

（三）对策与建议

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大力扶持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这方面的主要对策与建议是：一要积极采取多方面措施，推动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要适时提出立法建议，建立和完善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的用地需求；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为农村新经济组织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要强化对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公共服务职能，形成宽松的发展空间。二要在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初期，以自身组织优势推动农村新经济组织快速启动。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营造发展氛围；要着力抓好典型示范，加大引导力度；要不断推进机制创新，保障规范运行；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形成产业基地。三要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保障“能人”供给。要整合社会精英力量，加大人才输送力度；要重视党员发展工作，储备基层后备力量；要大力开展培训工程，提升人才综合能力；要加强作风建设，增强党员服务意识。四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谋发展。要在农村综合改革中谋发展，改革现行的农村管理体制，提高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行政能力；要在城乡互动进程中谋发展，把农村和城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统筹协调，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要在民间组织发育中谋发展，加大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不断提高党的社会管理能力；要在国际贸易格局中谋发展，大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效增强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农村各级党组织应当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件头等大事来抓。

（四）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跟进，开启了中国社会各大子系统形成分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

我们应当用系统的方法去考察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意义。首先，以农村新经济组织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崛起，将促进与政府、市场之间形成分工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子系统中，每一子系统均处于其他两大子系统“共同失灵”的领域，三大子系统之间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其次，执政党与三大社会子系统构成四面体结构。在这里，需要注意到，把执政党纳入国家范畴分析中国社会是不合适的，一个“强社会”的出现需要以“强政党”的存在为

必要前提，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区别于执政党与市场的关系，党居于文化之巅。再次，第四极的强势存在是中西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只不过情形恰好相反。西方社会以基督教为基础，西方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与基督教的作用密不可分，中国的儒家思想难以在近现代社会成为社会一极，这使得两类社会结构将会有着明显的不同。最后，不断明晰党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职能边界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界定好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职能边界是一个国家是否建立起现代化机制的重要标志，明确好党与社会各子系统的职能边界是关乎全局的重中之重，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明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这种职能边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而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跟进，则开启了中国社会各大子系统形成分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

总之，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同步跟进，将取得农村党的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的效果。一方面，将大大有利于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户和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农民得实惠的目标；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找到了新时期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有效抓手，改变了过去存在的就党建而抓党建、与经济工作“两张皮”的现象，转变了农村基层干部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从更广泛的意义看，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与社会各子系统紧密相关。当前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其自身发展中的问题，也是政党、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某些失调在乡村层面的具体体现。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需要党组织的跟进，更需要从宏观上进一步合理划分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职能关系。“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剖析农村新经济组织发展中党的建设这样的实例，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中国转型期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形成分工合作的伙伴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启迪意义。

第一篇

农村新经济组织

这一篇主要围绕“农村新经济组织”进行研究。本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界定“农村新经济组织”这一概念？它的特征、种类有哪些？为什么不直接用“合作组织”或“合作社”的概念？确立“农村新经济组织”这一概念有什么样的现实价值？农村新经济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尽管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很不容易，但必须要说清楚才行，否则课题研究就无法深入展开下去。对农村新经济组织的本质如何准确把握？它的发展对新农村建设有何现实意义？有何全局性意义？本课题研究认为，农村新经济组织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是中国“社会”崛起真正的生长点。



- 子课题一 农村新经济组织概念剖析
- 子课题二 农村新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分析
- 子课题三 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
- 子课题四 农村新经济组织是中国“社会”崛起的生长点

子课题一 农村新经济组织概念剖析

加强“两新”组织即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领域,理论界对此研究颇多,但多关注于城市中的“两新”组织,对于广大农村正在成长起来的“两新”组织、特别是对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价值的农村新经济组织及党的建设,目前关注不多。为此,需要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而其中,首要的是要对农村新经济组织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农村新经济组织是一大类具有不同程度“合作性”的农村经济组织

关于“农村新经济组织”这一概念,国内外相关专家都有过界定,目前在理论界并不统一。有的叫“农村中介组织”,有的叫“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的叫“新型农业组织”等。中共中央2008年“一号文件”中则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服务组织”。尽管称谓多样,莫衷一是,但其核心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主要是指当前农村中正在成长起来的、显著区别于传统组织的、为农村社会提供政府和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益性服务的、具有不同程度“合作性”的各类农村组织。近年来,这些组织大量涌现,种类越来越多,覆盖面越来越宽,影响越来越大,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 农村新经济组织的“组织”是“农民组织化”问题的关键

所谓组织,是指一定行为主体为追求某种共同目标而结成的关系共同体。组织是一个具有相对可识别边界的社会实体,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目标而进行合理管理和协调的开放系统。组织与制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组织需要制度来支撑与维系,同时组织又是制度的载体和化身,组织的内核是其内在的制度安排。

所谓“农村组织化”问题,是指“农民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和促进自身经济利益和提高自己社会政治地位而联合起来,形成各种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行动和过程”。^①“农民组织化”问题产生的基础在于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农民需要层次的不断提升、需要结构的日趋复杂。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社会需要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革的根本力量。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社会需要正在由基本生活层次向社区参与、经济自由、民主政治和追求个性四个方向逐次分化。一是向营造社区生活方向分化,如对水、电、路、环境等社区公共服务需要增强。只要是生活在同一村庄,就有共同的社区需要,以此为集体的行动就容易达成,相应的农民组织也就容易形成。二是向促进农业生产方向分化。比如,同为种植户,在耕地、水利、技术服务方面就有比较一致的共同需要;同样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户,种粮食的与种蔬菜的及搞养殖的就有不同的共同需要;即便同样是搞养殖的农户,养鸡户和养牛户也有不同的共同需要。三是向发展非农产业方向分化,如在基础条件、信息技术设施方面有共同需要。此外,同样是非农业户,搞水果贩运的与搞建筑装修的及搞农产品加工的就有不同的共同需要。四是向追求个性发展方向转化。现今

^① 程同顺:《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第35页。